

# 消费欲的“符号刺激”与 消费力的“结构抑制”

——中国城市普通居民消费张力的根源与后果

王 宁

---

【提 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为民众的消费欲望正名。先是通过“生活水平话语”，然后是“扩大消费”话语，国家解除了套在居民消费欲望上的意识形态禁锢，居民消费欲望被赋予合法性。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杠杆效应下，居民的消费话语获得了合法的发育和成长空间，相应地，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符号刺激而膨胀。但是，国家所沿用的低成本发展模式却对许多居民（尤其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形成结构性抑制。在这种发展模式里，劳动者只是被当作廉价的生产者来使用，而不是当作消费者来培养。由于收入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导致消费领域的双轨化：一边是高收入阶层和政府的消费主义，另一方面是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欲与消费力的失衡。于是，普通居民的内在张力（欲望与能力脱节）转变成外在张力，包括阶层之间的张力（如：仇富）和干群之间的张力（如：仇官）。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战略上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实现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消费欲望 消费能力 符号刺激 结构抑制 张力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2)03-0196-13

---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发生“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扩大消费不但成为政府、市场与民间的共识，而且也成为国家的一项经济政策。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其结局却是令人沮丧的。尽管这些年居民的消费量也在增长，但居民消费在每年的GDP中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如今已经下降到35%以下，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有人辩解说，国家的统计数据有误，漏算了居民的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但是，即使把这些算上，中国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依然严重偏低。这难免让人生疑：为什么国家有强烈的动机要扩大居民消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居民消费率却一直呈下降趋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其实不在于广大居民不想消费，而在于他们没有能力过多地消费。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现在

这样的情况：居民的消费欲望在起飞，但他们的欲望满足能力却受到各种结构性因素的抑制。换言之，中国居民在消费领域面临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一方面，他们的消费欲望不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合法性，而且被市场、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因素所刺激而不断膨胀；另一方面，他们的消费力却被各种结构性因素所抑制或限制。消费的欲望与消费的能力发生了脱节。这种脱节现象可以称之为消费欲的“符号刺激”与消费力的“结构抑制”的张力。当然，这种张力主要体现在中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中是不存在这种张力的。中低收入阶层占据人口的大部分。以广州为例。根据我们2011年12月在广州进行的样本数为5027的简单随机抽样电话调查（在个人月收入问题上的拒答率为18.9%），8.6%的受访者的个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38.1%的受访者的个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1000元以上”，有19.7%的受访者的个人月收入在“5000以下、3000元以上”。三项合计占66.3%。可见，个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受访者的三分之二。在广州这样的高生活成本的地方，5000元的个人月收入只能算中低收入阶层。这种收入水平以下的居民占据了人口的大部分。按照李强教授的调查，如果把农村人口算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倒T型结构，即：低收入阶层占据了人口的绝大部分，如同倒过来的T字母中的横线<sup>①</sup>。对中低收入、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来说，如果不对消费欲望进行适当的自我抑制，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是存在明显张力的。在本文中，鉴于中低收入阶层占据人口的大多数，我把他们称为“普通居民”，以区别于权贵或富裕阶层。本文的目的在于对于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张力的根源与后果进行分析。本文试图回答：第一，消费张力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赋予居民消费欲望以合法性，并力图把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扩大纳入国家政策作用的对象，但在客观上却以各种方式抑制居民消费的扩大呢？第二，消费张力导致了怎么样的社会后果？

## 一、消费欲的符号刺激

为消费欲望正名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客观后果。可以说，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消费欲望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合法性。这一变化是历史性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消费欲望历来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单位社会所谴责和抨击的对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第一，中国长期以来经济匮乏，人们在几千年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节俭观念和节俭技能。不切实际的消费欲望不但被看作是非理性的，而且是不道德的。消费欲望在传统文化中成为谴责的对象。第二，建国以后，国家在资源极度短缺的条件下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了配合这一战略的实施，国家在消费领域实行了抑制消费的政策，并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展开了对消费欲望的围剿。消费欲望（如贪图享受）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而被污名化。消费欲望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丧失了合法性<sup>②</sup>。与之相对，源于传统的节俭、简朴与节约不论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民间层面，都被视作一种美德，一种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消费伦理。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消费欲望处于高度的自我抑制状态，这种欲望的自我抑制形态，可以叫做节俭主义。在节俭主义文化中，消费欲望处于维持生存的必要水平，而过剩欲望则被严格地抑制，与此相关联，人们的欲望呈现为相对静止和停滞不前的状态。即使有变化，其变化的速度也比较缓慢<sup>③</sup>。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市场化改革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开始放弃节俭主义而步入消费主义。所谓消费主义，是一种与节俭主义不同的欲望形态，它呈现为欲望的不断

膨胀和无休止状态。人们不但不去对欲望进行自我抑制，反而不断地去探索自己的欲望，听任欲望的唤起，呈现为欲壑难填的状态<sup>④</sup>。这种处于不断膨胀的欲望，就是陈昕所说的观念性的消费主义<sup>⑤</sup>。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居民的欲望的起飞，加上收入的增长和产品供给的丰富，才有了中国城市消费革命<sup>⑥</sup>。

多种因素促成了中国居民由节俭主义向消费主义的转型。我在其他地方论述了这一转型的文化逻辑（意义供给机制的转型）<sup>⑦</sup>。在这里，我将借用坎贝尔的文化合法性视角来分析这一转型。坎贝尔指出，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伴随了消费欲望的革命，因此，工业革命与消费革命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促进。消费革命不但源于收入的增长和产品的丰富，而且也源于消费欲望的革命。而消费欲望的革命则不可避免地遇到传统欲望模式的障碍。如果没有去传统化的力量来解构传统欲望形态，消费欲望的革命就不能发生。坎贝尔认为，在英国，消费欲望的革命发源于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浪漫主义运动。诡异的是，浪漫主义是一场对工业革命的负面后果进行文化抵制的运动，但它却促成了现代消费主体性的诞生，而现代消费主体性（无休止的对新奇产品的渴望和追求）构成工业革命的内在条件之一。坎贝尔认为，浪漫主义为消费欲望的革命提供了文化合法性，没有浪漫主义，消费欲望的革命就没有合法性，就难以在社会层面扩展<sup>⑧</sup>。

无独有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同样发生了消费欲望的革命。但是，中国没有发生类似于英国那种浪漫主义运动。那么，在中国，去传统化的消费欲望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呢？由于中国是一个集权社会，居民的意见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形塑，因此，当国家意识形态宣布消费欲望为非法的时候，消费欲望是不可能获得文化合法性的。这正是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形。所以，要了解中国居民的消费欲望革命的合法化，不能仅仅从市民意识着手，而必须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着手。只有解除国家套在消费欲望上的意识形态禁忌，市民社会才有了探索、激活、调动或满足消费欲望的空间。而国家在消费上的意识形态禁忌的打破，是不可能由居民来完成的，它必须由国家（党中央和国务院）来承担。

那么，国家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提出了“生活水平话语”和“扩大消费话语”。前者是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后者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国家这两个关于消费的话语体系先后为消费欲望赋予了合法性。

### 1. 生活水平话语

生活水平话语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他在批判“四人帮”“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提出了生活水平低或贫穷是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的根源，要挽救社会主义，克服合法性危机，就必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人民也有权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暗示了人民追求较好的生活水平的消费欲望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sup>⑨</sup>邓小平还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sup>⑩</sup>很显然，邓小平意识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衡量标准“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

干什么？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sup>⑪</sup>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人民的消费生活的改善应该成为恢复党和国家的合法性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sup>⑫</sup>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过几年的改革，邓小平发现，生活水平提高，有效地帮助党和国家恢复了合法性资源（民望），提高了人民的满意感。“事实证明，改革是正确的，很见效。如果外国朋友都能看出我们的变化，看出我们搞得不错，我们自己的人民还能看不见？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sup>⑬</sup>

邓小平关于“反贫穷”话语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摒弃了毛泽东时代的抑制消费的意识形态性话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要通过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来体现，为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消费欲望提供了正当性。既然人民有权利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消费欲望就不再是国家意识形态谴责的对象，而具有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国家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具有杠杆效应，使得市民社会形成了消费的巨大渴望。八十年年代的收录机热和家电热，正是这种消费欲望的体现。

## 2. 扩大消费话语

扩大消费话语是在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党和政府为了应对该危机而在正式文件中提出来的。在国家关于消费的态度上，1998年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首先，在这个时期，商品供不应求的状况开始扭转，李鹏总理在1998年3月5日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到1997年，“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出现了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格局，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商品紧缺现象已经根本改观了”<sup>⑭</sup>。不仅如此，这个时期产品开始出现“相对”过剩<sup>⑮</sup>。在同一年，一个意外的国际性危机事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我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减少，同时，该地区对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大幅度减少。朱镕基在1998年3月指出：“最近，亚洲一些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种明显反映，其危害之烈、影响之大，比预想的严重。这场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前景还看不清楚，对我国已经产生和可能进一步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sup>⑯</sup>。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中国经济的全面紧缩<sup>⑰</sup>。面对这些困难，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扩大内需便是对策之一。启动和扩大消费市场，便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选择。江泽民在1998年2月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还特地做出了指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作好我们国内的经济工作，以增强我们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和优化结构的前提下，保持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为了保持这个增长势头，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sup>⑱</sup>。朱镕基也主张要继续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要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加快发展消费信贷，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支持居民购买住房和大件耐用消费品；积极引导居民增加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和旅游等消费，拓宽服务性消费领域。活跃市场流通，大力开拓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sup>⑲</sup>。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扩大消费市场的政策包括扩大农民收入，加大扶贫、尤其是中西部扶贫开放的力度<sup>⑳</sup>，开拓农村市场<sup>㉑</sup>，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

低收入者的收入<sup>22</sup>，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sup>23</sup>，扩大就业途径。1998年8月国家对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进行了调整，提高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1999年以来，连续三次较大规模增加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标准<sup>24</sup>，等等。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扩大居民在电信、汽车、家电、旅游（如：三个“黄金周”的确立）、文化、娱乐、体育、教育、住房等领域的消费支出。例如，为了鼓励轿车进入家庭，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汽车消费贷款办法》，允许各大银行开办汽车消费信贷业务。之后，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汽车进入家庭的政策。另外，国务院早在1999年就采取措施提高电话普及率。经国务院批准，从1999年3月1日起，信息产业部对邮政电信资费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调整后的电话初装费、因特网资费、长话附加费等大幅度下调，大大促进了电话的普及和因特网的消费<sup>25</sup>。

如果说，邓小平的生活水平话语只是为人民的正当消费需求正名，那么，1998年以后，国家把刺激居民的消费纳入了经济政策体系中，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促成国家关于扩大消费话语体系的形成的根源在于经济，即“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困难，而经济发展则成为国家合法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在国家层面，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从而确保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欲望也无形中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

国家的“扩大消费”话语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把扩大消费写入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从而成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指导性文件。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改善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扩大内需、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向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迈进，要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吃穿用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增加服务性消费；增加城乡居民居住面积，提高住房和环境质量；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计算机、轿车进入家庭，提高电话普及率；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居民消费环境”<sup>26</sup>。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sup>27</sup>另一方面，消费又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手段。为此，要“实施鼓励消费的政策，努力形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双拉动。”<sup>28</sup>2002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完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温家宝在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我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国内需求的稳定扩大，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良性循环。要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居民购买力水平；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发展消费信贷，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扩大服务消费领域，改善生产供给结构；各项改革措施要有利于增强消费者信心，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费。要通过不断努力，逐步改变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状况。”<sup>29</sup>

国家的扩大消费话语具有双重功效。一方面，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性宣示，表明消费不再是国家意识形态所谴责的对象，不再携带负面意义，具有了合法性。另一方面，扩大消费首次纳入了国家的政策范围。消费欲望不但在意识形态层面获得了正当地位，而且成为国家借助各种手段加以刺激的对象。

一旦套在消费欲望上的国家意识形态禁忌被解除，市民的消费欲望就会喷涌而出。不但如

此，市民社会也形成了自己的消费话语。一方面，市场部门出于盈利的需要，开始构建各种消费话语。例如，广告、美容杂志、时尚杂志、汽车杂志等就是市场有关消费欲望的话语。它们不但赋予消费欲望以合法性，而且教给人们各种“合法”的消费行为方式和消费选择。在这里，消费行为的“合法性”是以“品味”、“优雅”、“责任”、“关爱”、“情调”等论述而体现的。人们在探索和实践消费行为的合法方式的同时，也在建构自身的消费欲望。

另一方面，消费者自己也形成了民间消费话语。这种民间话语有不同的载体。一是口头话语，它通过互动群体（如家庭、朋友、同事等）的交流而得到动态的建构。二是网络话语，它通过互联网上的交流空间而被建构。例如，互联网有各种关于食品、咖啡、饮茶、时装、美容、减肥、家居、育儿、花卉、收藏、摄影、旅游等各种论坛。在这些论坛上，人们不但交流各种消费信息，而且建构特定的消费趣味。例如，一些消费者在论坛上“晒”自己的各种消费品或消费行为，从而引起他人的共鸣、羡慕和模仿。通过这种交流，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不但被合法化，而且被调动起来，并促使消费者采取行动来满足消费欲望。

不论是国家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性话语，还是市民社会的消费话语，都赋予消费欲望以文化合法性。由于它们是以话语体系的方式而出现，并对居民的消费欲望具有诱导作用，我称其为“符号刺激”。在这种话语的符号刺激下，居民不但免除了消费上的禁忌，而且可以在欲望空间上自由驰骋。

## 二、消费力的结构抑制

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承认消费欲望的合法性，并且也采取一系列旨在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举措。但是，国家的消费话语与国家所实行的低成本发展模式之间构成内在的张力。虽然在九十年代末国家就采取了扩大居民消费市场的政策，但对居民的消费能力的培养力度偏小，而对消费者现存消费能力的榨取力度偏大（如教育产业化、房改）。同时，尽管“扩大消费”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但这更多地是一种临时的应急性政策，一旦同其他实行已久的政策形成抵触，往往就会流于表面或形式主义。不仅如此，如果其他某些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对比刺激居民消费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更重要，或更符合党和国家的需要，且这些政策同扩大消费的政策构成矛盾，那么，前者的实施力度就会大于后者。我们看到，的确存在与扩大消费政策相抵触的其他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旨在保持中国经济的比较竞争优势的政策。这个政策体系常常是抑制居民消费的扩大或增长速度的<sup>⑧</sup>。也就是说，国家的政策与政策之间有时是“打架”的。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与抑制居民消费的政策并存，但由于抑制消费的政策更符合各级政府的目标或战略需要，因此得到更积极的落实。这一事实抵消了扩大居民消费政策带来的效应。

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扩大消费的政策难以撼动更深层的抑制居民消费的扩张或增长速度的政策体系，使得国家扩大消费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性的立场宣示，一种对待居民消费欲望的态度转向（从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到当代的肯定），一种积极地肯定居民消费的作用的国家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扩大消费话语就构成一个国家居民消费欲望的符号刺激。它呈现为一种符号，但未必转化为一种实质性的结构性力量。作为符号，它赋予居民消费欲望以合法性，并给予“市民消费话语”登场和居民消费欲望起飞以“文化许可证”。但是，这个“文化许可证”难以从根源上触动其他的抑制居民消费的政策体系。之所以国家会在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的同时维持和推行抑制居民消费扩大的政策，是因为国家长期以来奉行了一种“低成本发展

模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低成本发展模式呢？在借鉴了秦晖的“低人权成本”的理论的基础上，我在2010年《学术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论述了低成本发展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定义：低成本发展模式指的是政府和企业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sup>①</sup>。一方面，资本或企业在没有技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谋取利润，削减企业的义务性必要成本，即法律和规范所规定的企业为承担社会责任而应该支付的必要成本（包括对劳工的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为了经济发展目标或财政收入目标，不但默认企业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而且也削减自身所应承担的、在供给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公共品上的义务性必要成本（如降低在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公共品供给上的财政投入比例，卸载政府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城市圈地运动中压低征地补偿或拆迁补偿标准，以低成本获取城市各种建设项目所需的土地或空间资源）。

上世纪九十年代90年代以来中国所奉行的“低成本发展模式”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这里所说的“低成本”，是就企业或政府来说的，而不是就整个社会来说的。事实上，企业和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在其义务上的“低成本”投入），导致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代价”。很显然，“低成本发展”不能理解为“高效益发展”<sup>②</sup>。这种发展模式的综合效益不高的原因之一是未能促使中国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sup>③</sup>，未能促成这种转型的原因是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对居民的消费构成结构性抑制的模式。

为什么说低成本发展模式对消费构成了结构性抑制呢？

首先，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直接限制了劳动者群体的消费力的扩大。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劳动力当作生产者来使用，而不是当作消费者来培养。初次收入分配向资本或企业倾斜，导致劳动者所获得的收入比重偏低，而他们占据人口的大多数。表面上低劳动力成本显示了中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客观上既抑制了人口消费力的提升，又导致企业不思进取，不在技术和管上提高竞争优势，导致产业升级换代的步伐迟缓。随着2009年国家干预政策以来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推动的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企业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它们的利润减少，但同时产业转型与升级也无望。产业无法升级，中产阶级队伍就难以扩大，因为低端制造业不需要过多的中产阶级（这也正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主流人口的中产阶级化就无法实现。人口结构中低收入阶层比重过大，必然导致消费市场难以扩大。

其次，低社会福利成本的发展模式则抑制了居民的集体消费。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员应该既是私人消费者又是公民消费者（即享受居民作为一个公民而应该享受的、由国家或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消费品）。这种发展模式把人当作私人，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民。居民所缴纳的税收，用于建设社会保障和福利（集体消费品）的比例偏低，用来进行投资的比例偏高。在短期内，公共投资对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效应明显，但长此而言这种模式既促使私人消费者不敢放心消费（抑制消费），又加剧产能过剩。后者则仰仗居民扩大消费，而低成本发展模式却恰恰是抑制居民消费的发展模式。所以，这种发展模式创造了内在的无法克服的张力。与此同时，低社会福利成本的发展模式还抑制了居民在消费上的乐观主义。消费支出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费者对以社会生产力为支撑的经济形态、收入分配结构对于个体收入稳步增长的落实，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对个体权利的保障的乐观主义情绪所决定的。而低社会福利成本恰恰从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来解除居民在消费上的乐观主义情绪。它在某种程度上把个体所面临的确定和不确定风险转嫁给个体或家庭部门来承担，加剧了居民对这些风险的担忧，并迫使居民为应对这些风险进行储蓄，从而减少当期消费支出。

再次，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障成本的发展模式则是典型的生产型社会的体现，它的形成与这种发展模式强调生产者主权、打压消费者主权有关。在一个靠打压消费者主权的发展模式中，企业创新和进步就缺乏足够的动力或压力。既然劣质产品可以在市场上畅通无阻而且获得利润，有谁会去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呢？而劣质产品一定是低成本的，按这种模式来谋利的企业多了，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即主流效应），因为注重质量的企业不可能削减必要成本来保障产品质量。一旦消费充满风险，消费者就不得不尽量减少对可疑产品的消费（如国产奶粉）。

最后，低环境污染成本的发展模式则置消费者于被动受害的地位。消费者通过社会运动抵制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正当权利被打压以后，被迫接受单方面有利于污染性企业（及所在的基层政府）而不利于消费者（即被动消费污染物）的后果。环境污染对消费的抑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直接抑制。消费者直接减少消费那些与污染源有染的产品。另一方面，间接抑制。环境污染降低了住房等财富的价值，从而减少了消费者的财富，财富价值的降低会对消费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前面说过，低成本发展模式是指企业和政府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作为生产和管理型组织，企业相对于劳动者，政府相对于居民，在财富分配中拿走了过多的部分。也就是说，在所创造的GDP份额中，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所获的比重过大，普通居民所获的比重过小。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的比重又过低。

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个就是隐含在低成本发展模式背后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就是工具主义的人力观。这种工具主义的人力观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国以后，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赶超”目标，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但重工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资源短缺，但唯一不缺的是劳动力。因此，为了在一个贫穷的国度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必然导致两个相互关联的后果：一方面，节省和集中一切资源用于工业化建设，包括抑制居民的消费；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弥补物质条件不足困难。隐含在国家决策人背后的观念是：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需要牺牲一两代人的利益（节衣缩食）。这一两代人做出牺牲，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这种集体性滞后享受的观念，导致国家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的政策取向。在国家决策者眼里，劳动者只是劳动力，这是必须最大程度地加以激励的对象，但又不能采取物质激励（低成本发展模式），而必须采取非物质激励（精神激励）。与此相对应，国家对居民的消费或生活采取了抑制政策<sup>③</sup>。消费作为目的，被降格到劳动的地位之下。为了掩饰这一工具主义的人力观，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把劳动升格为至高无上的目的，并同时把消费降格为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手段。这样的政策取向就是把劳动目的化，把消费手段化。既然劳动被视作居民的目的，必然导致国家对劳动榨取的最大化。既然消费被仅仅视作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手段，必然导致国家在居民消费领域里的投入最低化。这就是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来源。它的最初体现就是产业工人或城镇职工的低工资政策。而产业工人和城镇职工的低工资政策又延伸到了农村，因为为了配合低工资政策，还必须实行基本生存资料（农副产品）的低价格。为了确保这种低价格，国家于1953年实行了粮油等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并于1956年



在农村推行了合作社制度，1958 年以后又升格为人民公社制度，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确保了农副产品的低价格。同时，为了配合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居民追求消费享乐的动机保持严厉的谴责和高压状态。在那个时期，消费主义不但在经济的意义上不可行，而且在政治上成为一种禁忌。

这种工具主义的人力观也延续到今天。改革开放同样是一种“赶超”运动，即现代化运动。改革前的“赶超”是封闭式“赶超”，而改革后的“赶超”是开放式“赶超”，即融入到全球化过程中的“赶超”。这一特征导致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工具主义人力观得以延续。正是在开放进程中，计划经济时代的城镇职工低工资政策和农村居民低收入政策的遗产成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比较竞争优势<sup>⑤</sup>。为了维持这种比较竞争优势，各地政府都采取了偏资本的政策立场，不愿意丧失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比较优势。为了吸引境外直接投资和产业进入本地，各地政府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竞争。为了招商引资，同时也为了做大本地 GDP，各地政府不惜降低污染排放标准和控制力度，同时，为了本地经济指标，各地政府也对生产经营者在产品质量的制定和监控上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办法。至于消费者的消费安全是否受到威胁，则被看作是次要的，甚至被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由于政府是一个经济发展型政府，社会保障和福利被看作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所进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导致政府在社会保障和福利上的财政投入比例下降，而节省出来的资金被用来投资，包括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在这里，社会保障和福利成本的很大一部分被转嫁到家庭部门。低工资与低福利成本的发展模式显示出与计划经济时代一脉相承的工具主义人力观：劳动者只被看作是一种实现“赶超”（现代化）的手段，是一种生产力要素，因此必须尽可能压低成本，包括保持低工资、低福利。同时，由于劳动力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不必在保证产品质量和环境质量上投入过多成本，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即便是在道义上的义务性必要成本，常常也可以削减。

于是，我们看到了国家政策的一个内在张力：一方面，国家客观上需要扩大居民消费来促进经济发展，并在国家话语上肯定了居民消费欲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所实行的生产主义导向的制度安排（低成本发展模式）却从结构的层面抑制居民消费的扩大。在低成本的发展模式中，人只被看作是劳动力，只被当作生产者来使用，而不是当作消费者来培养<sup>⑥</sup>。在这种工具主义的人力资源观的支配下，即使国家采取了各种旨在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大部分政策的着力点不在于通过建立制度性管道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而在于建立有助于榨取居民有限消费力的制度（如教育产业化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其中，榨取消费者最甚的是住房改革。它不但榨取了普通消费者现在和未来的消费力，而且在客观上连同购房者父辈的储蓄也一并榨取。

在某种程度上，消费抑制是政府所推行的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无意识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直接导致了“低社会福利成本”的发展模式。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不但实践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榨取”居民消费的政策举措，从而在客观上抑制了居民的总体消费力。以住房为例，住房改革直接促成了“土地财政”的兴起，成为 2000 年代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但是，尽管本地 GDP 上去了，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也大幅度提升了。这就迫使企业不得不给工人增加工资，否则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珠江三角洲出现的“民工荒”正是由于企业支付劳动力的工资不足以让劳动力完成再生产的功能而出现的民工向异地流动的后果。而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提升

(以及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则使得低成本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可见,能够瓦解低成本发展模式的力量,恰恰是低成本发展模式本身。当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不再低廉的时候,低成本发展模式必定进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而产业升级的缓慢和困难,则使得中国经济步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困境。

### 三、消费张力的社会后果

很显然,消费欲望的符号刺激与消费能力的结构抑制形成了张力关系。人们所欲求的消费目标具有了文化上的合法性(如拥有产权房、别墅或豪宅),但由于低成本发展模式的结构性抑制,使得人们没有实现这种目标的有效手段。

当然,不可否认,收入并非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脱节的唯一原因。二者脱节的原因之一在于二者变化的相对速度。即便一个人的收入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水平,但如果他形成了上层阶级的欲望,同样会形成消费欲望与能力的脱节。导致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不能同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教育水平。一般来说,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形成较高的消费欲望。一旦他们的收入跟不上消费欲望所要求的支付能力,就容易形成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脱节。因此,尽管中国目前的大学毕业生群体的起薪比农民工高,但他们比后者更容易产生消费张力,因为他们对收入的期待更高,同时也更容易形成消费欲望,而事实上他们的起薪常常低于他们的期待,这些收入也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消费欲望。与此同时,低收入阶层如果坚持一种宿命论的观点,接受低收入的事实,视低收入地位为宿命安排,因而对消费欲望的外部诱惑或刺激具有免疫力,同样不会产生消费张力。此外,年龄也是一个对消费欲望起调节的变量。因此,理论上,在控制了教育水平、宿命论和年龄等变量以后,消费张力的强度与收入的高低成反比。在给定的消费欲望下,消费能力越低,消费张力越强。反过来,在给定的消费能力下,消费欲望越是超过消费支付能力,消费张力越强。消费张力会导致一系列负面社会后果。

#### 1. 社会挫败感

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脱节,导致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挫败感(即:自认是在社会上失败的一群),从而引发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质疑,导致“改革开放”合法性的流失。消费张力所导致的这种挫败不是一种个体事件(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失望),而且是一种关系性事件。例如,由于消费欲望的提升,许多女性及其父母在择偶时对求偶的男性的消费能力(收入、财富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有房有车)。女性择偶上的物质标准提高,使得男性在进入婚姻市场的门槛大大提高,从而使择偶的物质成本大大攀升。为了满足女方的物质标准,男方不得不拼命工作,甚至不惜透支身体。而许多年轻人(如进城的农民工)不论如何拼命工作,也难以满足城市女性择偶的物质标准。婚姻的物质主义化和情感和人品取向让位于物质的取向导致许多人在婚姻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婚姻市场上的这种社会排斥(以财力为中介)难免导致社会怨恨。不仅如此,即便结了婚,也有可能因为物质生活水平上的拮据而导致婚姻的破裂,从而让许多离异者形成挫败感。

#### 2. 社会失范

莫顿认为,文化目标与实现该目标的手段的缺乏,往往导致“社会失范”。即是说,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因此而不择手段,以非法的或社会所不赞同的手段来达到其目标<sup>④</sup>。各种谋财害命的刑事案件的增加,以及经济犯罪的增加,均是这种社会失范的体现。除了违法现象,各种不道德

现象也随之增加，例如，一些女生为了购买奢侈消费品而卖淫，或为了获取住房而心甘情愿地充当有钱人的“小三”。这种社会失范会导致社会系统的功能错位。例如，一些官员凭正当的工资收入无法满足膨胀起来的消费欲望，因此通过人为地设租或寻租而获取非法收入，一些教授凭法定的工资收入过不上中产的生活，因此忙着做横向项目创收而不务正业，而少数警察也因为其工资无法满足其消费欲求而自甘堕落，与黑社会或盗匪勾结一气共同分赃，等等。

### 3. 社会怨恨

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脱节还体现在人与人，或阶层与阶层的比较所引发的后果。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穷人入不敷出，而富者的财富则急剧增加。一些富人的炫耀性消费则不断刺激着普通消费者的神经。由于新富阶层所具有的“原罪”，心理学教科书所说的“酸葡萄心理机制”在普通消费者那里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常常质疑这些人致富的合法性。面对做生意的富人，他们会提出这些质疑：这些富人有没有行贿？是否偷税漏税？是否为富不仁？在这方面，“郭美美现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富人是官员，他们的质疑则是：凭官员的工资收入支撑得起这种奢侈的消费水平吗？他们的财富是否通过寻租或受贿得来的？为什么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被官员所反对？他们是否要借机敛财？在这方面，“周久耕现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于是，对于富人的非法致富的质疑，成为许多人仇富的理由。由于富人成为社会不公状况下的赢家，因此，对社会不公的怨恨，就转化为对富人的怨恨。其结果，是阶层之间在心理上的对抗。在这里，引起社会怨恨既有社会不公的原因，也有普通消费者的欲望与满足欲望的物质能力脱节的问题。

普通消费者在消费欲望与能力上的脱节，还导致政府的合法性资源的流失。所谓合法性资源，就是政府在民众中的正面的声望或声誉<sup>⑧</sup>。例如，如果消费者既买不起房，又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那么，消费者就会把怨气发泄到政府身上。而政府部门在“三公”消费上的慷慨或奢侈，则使得权力型的消费主义与普通民众的消费欲望与能力的脱节，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在客观上既刺激了民众的神经、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又给人们发泄对政府的怨气提供了道义上的借口。

正是由于富裕阶层和政府消费上的示范，不但为底层阶层的消费欲望充当了参照群体，进一步刺激起他们的消费欲望，而且让底层阶层的消费失衡变得在心理上不可接受。于是，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他们把怨气发泄到新富阶层和政府身上，并为这种怨气找到了合法的理据（如：商人的“原罪”、官员的腐败、公共财政的不透明）。于是，普通民众的内在的心理张力就转化为外在的社会张力，包括阶层之间的张力（如仇富）与干群之间的张力（如仇官）。

##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为民众的消费欲望正名。先是通过“生活水平话语”，然后是“扩大消费”话语，国家解除了套在居民的消费欲望上的意识形态的禁锢，居民消费欲望被赋予合法性。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杠杆效应下，市民社会的消费话语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相应地，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符号刺激而得到膨胀。但与此同时，国家所沿用的低成本发展模式却对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形成结构性抑制。当然，这并不是说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是说，大部分人的收入与消费未能取得与GDP同速率增长。同时，由于许多消费品从奢侈品降格为廉价的必需品（如家用电器），普通消费者会不断形成对新产品的占有欲望。但由于收入跟不上，这种欲望常常难以满足。

导致消费张力的根源在于低成本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里，劳动者只是被当作廉价的生产者来使用，而不是当作消费者来培养。与此同时，由于收入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导致消费领域的双轨化：一边是高收入阶层和政府的消费主义，另一边是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失衡。于是，普通居民的内在的心理张力转变成外在的社会张力，包括阶层之间的张力和干群之间的张力。

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逐步转变低成本发展模式。事实上，随着近些年“民工荒”的常态化，人民币的升值，以及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升，低成本发展模式已经渐渐显示出穷途末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推出历史的舞台。事实上，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也由于“退出成本”的原因，低成本发展模式还是许多地方政府的不二选择。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将陷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窘境。

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的选项之一乃是改变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改为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为此，就必须实现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改变关于人力的概念：人力不但是生产力，而且是消费力。因此，不但要把劳动者当作生产者来使用，而且要当作消费者来培养。而培养的方式就是改变收入分配的现状，建立全国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增强消费者的主权，并通过消费者的公共参与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相比于消费欲望的刺激，消费能力的培养更为重要。但是，现行的做法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一边任由普通大众的消费欲望起飞，另外一边却对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进行结构性抑制。欲望的落空是有社会代价的。但这不是说我们应该重新对居民的消费欲望采取意识形态性的谴责和抑制，而是说，我们应该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消费者保护制度和居民的公共参与制度的建设，来为消费者赋权，增强他们的能力，并以此间接地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通过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方式促进消费型社会的来临。

---

①李强 《“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北京《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②③④王宁 《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③⑦王宁 《从节俭主义到消费主义转型的文化逻辑》，兰州《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4~22页。

④（1）Colin Campbell（1983）：Romanticism and The Consumer Ethic: Intimations of a Weber - Style Thesis. *Sociological Analysis*, Vol. 44, No. 4, pp. 279 - 295.

（2）Colin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⑤陈昕 《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⑥ Deborah S. Davis (ed.):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⑧ Colin Campbell (1983): Romanticism and The Consumer Ethic: Intimations of a Weber - Style Thesis. *Sociological Analysis*, Vol. 44, No. 4, pp. 279 - 295.

⑨邓小平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1页。

⑩⑫邓小平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1页。

⑪邓小平 《用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改造企业》（1978年9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0页。

⑬邓小平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

- ⑭李鹏 《政府工作报告》(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1998年3月5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13页。
- ⑮陈淮(主编:《过剩经济!过剩经济?——形势与对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 ⑯朱镕基 《励精图治,廉洁高效,做好跨世纪的一届政府工作》(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3月24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67页。
- ⑰本段从“第二”到“第四”的主要论点,来源于:吴敬琏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365~366页。
- ⑱江泽民 《做好国内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1998年2月26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05页。
- ⑲朱镕基 《政府工作报告》(在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99年3月5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78页。
- ⑳江泽民 《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夺取八七扶贫攻坚战阶段的胜利》(1999年6月9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0~851页。
- ㉑朱镕基 《政府工作报告》(在九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2000年3月5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174页。
- 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392页。
- ㉓(1)江泽民 《全党动手,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1998年5月14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57~371页。(2)朱镕基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几个问题》(1998年5月16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72~379页。
- ㉔⑤李通屏 《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74~175页;第184页。
- 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392页。
- ㉖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一),新华月报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 ㉗朱镕基 《政府工作报告》(2003年3月5日在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一),新华月报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9页。
- ㉘温家宝 《政府工作报告》(2004年3月5日在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一),第363页。
- ㉙我所说的国家对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抑制并不意味着居民的消费没有增长,而是说,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2000年代以来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原来的5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低于35%,不但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 ㉚⑫王宁 《中国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演进、困境与超越》,广州《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第63~73页。
- ㉛⑬王宁 《中国何以未能走向消费型社会——低成本发展战略与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困境》,上海《社会》,2009年第2期,第30~52页。
- ㉜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㉝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Glencoe: Free Press, 1957, pp. 141-149.
- 作者简介: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左晓斯]